

张利民 主编

URBAN HISTORY
RESEARCH

城市史研究

(第31辑)



天津社会科学院 中国城市史研究会 主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URBAN HISTORY

URBAN HISTORY

URBAN HISTORY

城市史研究

（第1卷第1期）



中国城市史学会 中国城市史学会 中国城市史学会

中国城市史学会

天 津 社 会 科 学 院 中 国 城 市 史 研 究 会 主 办

城市史研究

(第31辑)

URBAN HISTORY
RESEARCH

张利民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史研究. 第31辑 / 张利民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097 - 6430 - 5

I. ①城… II. ①张… III. ①城市史 - 文集 IV. ①C912. 8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1209 号

城市史研究 (第 31 辑)

主 编 / 张利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李丽丽

责任编辑 / 宋荣欣 赵 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430 - 5

定 价 / 6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城市史研究》 编委会

顾 问 张 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新平 王立国 李长莉 何一民 苏智良

张利民 张鸿雁 周 勇 周俊旗 涂文学

靳润成 熊月之 戴一峰

本期主编 张利民

副 主 编 任云兰 任吉东 王 敏 范 瑛

编 辑 (按姓氏拼音为序)

成淑君 丁 芮 刘凤华 万鲁建 王 静

熊亚平 许哲娜 张 博 张献忠

目 录

市政管理与规划建设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建设方针的提出过程及原因

..... 李国芳 / 1

论抗战胜利前后重庆的城市功能转型 孙明理 / 12

浅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房屋租赁纠纷与应对

——以天津为例 尹学梅 王 静 / 19

区域体系与经济发展

渐远渐失：近代保定和北京城市的关系 张慧芝 徐 蕊 / 30

近代天津与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沿线城镇间商品流通初探（1860~1937）

——以德州、临清、聊城、济宁为例 熊亚平 安 宝 / 39

空间结构与环境变迁

清末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市民卫生观的初步确立

——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张海荣 / 52

“回到现场”：日常生活视野下的空间秩序与城市社会变迁

——评杰拉姆《街头生活：沉默的20世纪欧洲史》 王 静 / 73

社会阶层与文化教育

- 清代天津的士绅慈善家述论 任云兰 / 78
- 唾骂声中的改革
——试析港督麦当奴的治赌实践 毛立坤 / 92

海外研究

- 赢得地盘:天津运输工人
..... [美] 贺萧 著 许哲娜 喻满意 译 刘海岩 校 / 130
- 天津的朝鲜人 [日] 幸野保典 著 万鲁建 译 郑颖 校 / 161
- 1920年代后半期至1940年代天津义务教育的进展及其背景
..... [日] 户部健 著 刘风华 译 户部健 校 / 189

学术述评

- 斯人已去,事业永续
——隗瀛涛先生城市史学理论刍议 毛 曦 / 222
- “三生有幸”
——“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 许哲娜 / 230
- 三十而立: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门户与路径
——以“首届中国城市史年会”为例 丁 芮 / 239

Abstracts / 244

稿 约 / 251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建设方针的提出过程及原因

李国芳

内容提要：19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地攻占城市，着手城市管理工作，并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的眼光，着眼于对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判断，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以实现工业化使命，逐渐形成了新的城市建设方针。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城市以往均为“消费城市”，自己的目标就是把其变为“生产城市”。

关键词：城市规划 城市建设方针 中国共产党 消费城市 生产城市

“消费城市”与“生产城市”，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对城市既有经济状况的大体评估，及对城市未来建设方针的总体判断。换言之，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城市本应是现代生产方式主要是工业生产的集聚区域，也是中国实现独立、富强梦想的重要支柱。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城市虽然显示出繁华与喧嚣气象，但更多地依赖商业、服务业等行业，而恰恰缺少发达的工业；未来的中国要实现独立、富强，唯一之途便是在城市中发展工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变中国为工业国。

那么，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这一城市建设方针是怎样形成的呢？中国共产党人缘何提出该方针呢？本文拟围绕党史研究中的这个薄

弱问题^①做一大致梳理。

一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新方针的形成

抗日战争结束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工人、农民进行革命,未及长期占领城市,并以城市主人的身份看待、管理城市,如何建设城市的问题自然提不上议事日程。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干部与部队进军东北,首先在东北有了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等数座城市,从而开始思考如何管理城市、改造城市与建设城市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工农劳动者的利益,宣扬“劳工神圣”,并曾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大力提倡改造农村中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些城市中看到大量的闲散劳动力构成一个纯粹“消费”而不“生产”的特殊群体,终日无所事事之后,便决心改变这种现象。在牡丹江市,该市领导人提出,为了搞好财经工作,最迫切的任务便是紧缩城市,把闲散劳动力、逃亡地主及“旧的城市的统治阶级”及其“走卒”,“包括警察、特务、腿子,以及与此有联系的统治分子”等15000人迁移到乡村。面对这个举措是否会影响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疑虑,中共牡丹江市委书记张烈解释道:“有的同志怕城市人口减少会影响工商业,影响城市之繁荣,实际恰好相反,城市里单纯消耗的人越多,城市的负担就越重,只有人人参加生产,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农民富裕,工业发达,才会有真正的繁荣。”^②在颇受俄罗斯风习影响的哈尔滨,市民烫发与妇女涂口红并不鲜见。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不但与“生产”无关,而且属于“旧社会奢侈颓靡之劣习”,因此首先通令市政府及“附属机关之学校男女员工

① 在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城市学、城市史或经济史领域的专家学者贡献最多。如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1~2002)》,西苑出版社,2003,第578页;董志凯《从建设工业城市到提高城市竞争力——新中国城建理念的演进(1949~2001)》,《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李益彬《启动与发展——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规划事业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第28~30页等。但这些论著对该问题一般均泛泛带过,并未详细考察其提出过程、原因等问题。

② 张烈:《关于移民问题(节选)》(1946年8月),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疆旭日——牡丹江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第42~45页。

不得烫发，女教员、女职员不得涂抹口红”。^①

对于牡丹江市的上述做法，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高层完全赞成。1947年3月，东北局把“组织与强迫城市流氓与失业者到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列为如何发展生产的措施之一。^②东北地区的其他城市，如哈尔滨、齐齐哈尔等积极响应。^③据统计，自该年11月至次年3月，哈尔滨市共移民7000余户将近3万人“下乡生产”，^④1948年则有1.3万户3万余人被移出哈尔滨市“开荒、造林、打鱼”。^⑤

在华北地区，因为中国共产党军力相对较弱，攻占城市也相对较迟。到1947年11月，晋察冀野战军才占领了一座大城市——石家庄。为了肃清城市中的“不稳定因素”，稳定城市秩序，中国共产党准备把几万名逃亡地主驱逐出城。问题是，石家庄是一座主要依靠铁路交通而繁荣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人口聚集与周边交通至关重要。故在石家庄与周边城市交通难以很快恢复正常的情况下，骤然间驱逐几万名消费能力较强的逃亡地主出城，很可能会影响到石家庄的商业贸易。对此，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并不担心。他估计，这样做，“石家庄的商业可能要缩小些”，但这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繁荣市面”绝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今后支持石家庄建设的是精干的生产事业”。^⑥刘少奇为石家庄所指明的发展方向及随后石家庄的实践，同样得到了中央工委常委朱德的肯定。朱德称：“过去这些城市里面是一些什么呢？是封建官僚的堡垒，他们并不一定要生产。而是他们把这些地方统治起来，归他们去压迫剥削乡村和城市里面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他们服务。现在我们进城了，要组织人民大众发展工业生产。过去在衙门做事的人，现在也要把他们变成生产者，使

① 《哈尔滨特别市政府通令“秘字第3号”》（1947年1月16日），哈尔滨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哈尔滨特别市政府公报》第1期，第12页。

② 东北局：《关于1947年度财经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1947年3月4日），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6页。

③ 《东北城市移民下乡参加明年生产运动》，《人民日报》1947年12月6日，第2版。

④ 《哈市移民月底结束》，《东北日报》1948年3月19日，第2版。

⑤ 李富春：《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1949年3月7日），《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第62页。

⑥ 《刘少奇同志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194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09页。

他们不是靠衙门吃饭。我们是要人民自己办自己的事，把整个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①

为了把东北、华北城市的上述做法推广开来，更为了给中国共产党即将大规模占领的其他城市明确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与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先后刊发数篇新华社通讯，首次公开提出了带有明显导向性的“生产城市”概念。其中，1948年6月下旬的一篇通讯报道说：“哈尔滨市工业继续飞速发展，工业成品的出产逐月猛增。现哈市在民主政府正确工商业政策指导与扶植下，日益向生产城市方向发展。”^②另一篇通讯则开门见山地强调：“牡丹江市经过‘吸收外资发展工业’及逐渐纠正了敌伪统治期间残存的与国民生计无益的畸形商业繁荣后，现全市正当工商业已获得迅速发展，基本上消灭了失业现象，成为一个生产的城市。”^③同年9月的另一则报道同样以牡丹江市为例，说明经过共产党三年来的改造，该市已从“一座消费的城市慢慢的转为生产城市”。^④

很快，把“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的例证接连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如《牡丹江成为相当电气化的城市，工业发展速度超过商业，非必需的行业日趋减少》《洛阳经过半年建设，逐渐变成生产城市》《在毛泽东旗帜下走上光明大道，石家庄解放一周年业已变成生产城市》等。^⑤

与此同时，对共产党占领下华北地区其他一些城市的不同做法，华北局坚决予以否定和批评。当时，一些城市工作干部“对外来非必需品不是坚决禁止，存在有依靠这些外来非必需品来繁荣城市的思想”，“忙于开澡塘，开戏院，举办庙会”，试图依靠商业、扩大消费来“繁荣城市”。对此，华北局认定其均为“模糊观点”“错误思想”，是与发展城市、繁荣城

① 《朱德在华北工商业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5月21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第681页。

② 《哈市工业飞速发展，工业成品逐月猛增》，《人民日报》1948年6月22日，第2版。

③ 《工商百业迅速发展，牡丹江成生产城市》，《人民日报》1948年6月27日，第2版。

④ 《牡丹江面貌改观，逐渐转为生产城市》，《东北日报》1948年9月30日，第1版。

⑤ 《人民日报》1948年10月20日，第2版；1948年11月8日，第2版；1948年12月2日，第1版。

市的方针背道而驰的。^①

1949年前后，随着攻克的城市越来越多，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聚集了中国经济之现代部分的城市中。此时，使全党了解如何恢复与发展城市经济，如何改造城市经济，稳固在城市的统治，就成为一名十分迫切的工作。鉴此，在总结以往城市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②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提升为“当前的重要任务”。^③显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最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并上升为全党的意志与共识。

至于何谓“生产城市”，时任大连市领导人的韩光曾针对大连市数年来的做法，做过这样的描述：“生产城市的基本特点是广泛的参加生产与劳动；并且其生产的成果，其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本市或本区全体人民的消费量。”具体来说，就是工厂种类多、工人在各阶层中所占比例最高（或较高）、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消费总额、具备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化娱乐场所及生活方式围绕生产进行。这种特点反映到城市面貌上，即“工作时（上班时），街上冷清。有人说像‘防空’，形容得很好。这时市场上‘萧条’，买东西的人不多，摊贩行商叫卖者杂乱于街头的现象是找不到了。工厂则忙，人大部都集中于工厂”，没有所谓“繁荣”的夜市。按韩光的理解，“消费城市”与此相反，其面貌是“早上（直到九点钟罢）街头人稀少，除了学生和叫卖者以外，很少找到行人。有电车的城市，上午十时前，没有什么乘客，午间与下午（四点以前罢）车上才拥挤起来。市场整天客满。夜间，人们精神倍足，妓院、戏院、舞厅、赌博场、街头都

① 《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关于华北工商业会议后工商业政策执行情况的工作综合报告》（1948年10月7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第391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8页。

③ 《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日报》1949年3月17日，第1版。

充满着人群,挤来挤去”。^①

二 缘何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下来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城市建设新方针,在建国后虽然并没有一直大张旗鼓地予以宣传和倡导,但实际上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现实任务结合在一起,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进程。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会对旧有城市产生“消费城市”的认识,强调必须把这些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工业生产而非“消费”等商业行为才是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不二法门,才是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条件。

作为东方的泱泱大国,中国在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面对痛局,国人不断探求改变积贫积弱状况的道路。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在“西化”概念基础上,率先提出了“现代化”的理念,并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核心界定为工业化等经济问题。^②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对比考察,同样接受了这种思想。刘少奇曾指出:“现在世界上凡是强大的国家,都是工业国……我们中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我们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③同时,毛泽东从中国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这个角度分析道:“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

① 《生产城市、劳动城市——韩光同志在一个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天津市人民政府秘书处编印《天津市政》第2期,1949年9月15日,第44~49页。

② 参见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21页;阎书钦:《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现代化”理念的形成及内涵流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192页。

③ 刘少奇:《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4年5月20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302页。

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①而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展望未来，再次肯定了工业化对于中国未来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轻重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地位升到工业国地位上去。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们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倍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们的基础，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是不能巩固的。”^②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苏联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目标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即将完成之际，估计到当时中国的工业生产少得可怜，最多只占国民经济的10%~20%，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暂时搁置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③对苏联情况更为熟悉的任弼时则以苏联为例，突出强调了工业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说：“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俄国在一九一三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点一，而我们现在还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有什么办法转入社会主义呢？当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可以不必达到百分之四十几，但大致说来，总不能少于百分之三十。”^④

总之，无论从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理想出发，还是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出发，中国共产党人都非常清楚：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便确

① 毛泽东：《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4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46~147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第335页。

③ 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21页。

④ 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1949年3月13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430页。

定了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①而城市作为承载现代化使命的主体，理所当然地必须以工业主要是重工业的发展为重点方向。原来多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消费城市”也必须向“生产城市”转变。

其次，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重性。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不只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是工人劳动力在商品中物化的过程。相反，商品交换仅仅改变商品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而不能增加流通中的价值总量，不能增加整个资产阶级的财富。换言之，纯粹的商品流通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和剩余价值，商业利润只是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对于上述马克思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倡导革命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人显然也是掌握和理解的，并以之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解决根据地物资极端缺乏的特殊状况，毛泽东指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农、工、商业的轻重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②再如，1948年召开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认定，“商业本身不能生产财富，创造价值”。^③相对熟悉马克思相关理论的任弼时、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对这一点讲得则更明白。任弼时曾指出：“商人当然有剥削，商人的商业行为本身不生产任何价值，他们或者是分享资本家一部分利润，或者是直接对生产者消费者实行剥削。”^④周恩来也讲过：“工业是生产的，商业则附属于工业，投机性大，必须区别二者。”^⑤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形成建国方略之际，全国范围的商业投机日形肆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585、592页。

②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62页。

③ 《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综合报告〉》（1948年5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292页。

④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选集》，第430页。

⑤ 周恩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1948年6月21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05页。

虐，通货如同脱缰野马般疯狂膨胀。在理论、现实及中国重农抑商的历史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刚刚进城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动用各种经济措施、行政手段甚至专政职能打压商业投机，抑制通货膨胀，结果仍不能立时奏效。基于此，深受其苦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商业自然不会抱持什么好感，痛斥其“有时囤积居奇，作投机事业，为害更大”^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既然商业，尤其是私营商业的存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新政权就没有理由为其留下什么生存空间。具体说来，即“商业的发展方向是国营资本、合作资本。现在在法律上不禁私商，我们要用国家商业资本、合作资本来调节私人商业资本，私人商业要在我们的控制下营业”。^②“我们应发展工业资本，反对商业资本。用经济的办法挤掉他。”^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商业的认识、痛恨甚至敌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转变“消费”型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次，苏联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影响。1949年夏，随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以及中苏两党之间的互相了解，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恢复经济。^④此时，中国因为对经济建设缺乏经验，故须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对于城市建设，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就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反对欧美式资本主义市政建设观点”，并认为“这是城市建设人员和技术人员思想上必须解决的问题”。^⑤而苏联专家依据苏联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强调城市规划要“贯彻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⑥例如，对北京到底应该如何建设，苏联专家建议，“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

①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选集》，第430页。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8月17日），《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58页。

③ “朱德在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8月17日）。

④ 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第62~74页。

⑤ 刘秀峰：《大力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的领导》（1952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 and 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第607页。

⑥ 赵士修：《我国城市规划两个“春天”的回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编《五十年回眸——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商务印书馆，1999，第16、17页。

四，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联〕想到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北京市相关部门领导人完全同意，并强调：“首都建设应该以发展工业为最中心的任务，要积累一切可以积累的资本投资于工业，因此以最经济的方法进行行政中心的建设并使北京更加美丽与现代化是必须采取的。”^①

最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标榜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但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从1920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首先从农村积蓄力量。结果，当194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攻占城市之时，中国共产党发现自己的成员绝大多数来源于农民。^②为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称：“蒋介石的国都定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把国都建在北京，我们也要在北京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③换言之，中共中央开始着力使自己回归到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寄以无限同情……进行‘归队工作’”，^④坚决依靠工人阶级。而要扩大与依靠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城市工业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1950年代初，当看到“五一”“十一”游行队伍中工人人数较少时，毛泽东很不满意，就警告北京市领导人：北京市如不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壮大工人队伍，就要把首都迁到工业与工人比较集中的上海去。^⑤

鉴于上述状况，北京市领导人极为焦虑，声称：“如果在北京不建设大工业，而只建设中央机关和高等学校，则我们的首都只能是一个消费水平极高的消费城市，缺乏雄厚的现代产业工人的群众基础，显然，这和首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随后，北京市再次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反映，北京

① 曹言行、赵鹏飞：《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1949年12月19日）及其附件巴兰尼克夫：《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2、4页。曹言行、赵鹏飞当时分别任北京市建设局局长、副局长。

② 《安子文同志五月份向毛泽东同志所作的综合报告》（1949年5月11日）。

③ 傅颐：《彭真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访马句》，《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第60页。

④ 《中央关于纠正在新解放城市中忽视工运工作的偏向的指示》（1948年12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615页。

⑤ 傅颐：《彭真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访马句》，《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第60页。